

WANG
MENG
WANG
MENG
WANG
MENG
WANG
MENG
WANG
MENG
WANG
MENG
WANG
MENG
WANG
MENG

王蒙

曾 镇 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晓丹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韩美林

版式设计：李玲玲

王 蒙 论

曾镇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顺义永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31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册

ISBN 7-5004-0168-3/I·18 定价：2.75元

读《王蒙论》致曾镇南（代序）

镇南同志：

我刚读完了王蒙的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力作《活动变人形》，接着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二十万字的力作《王蒙论》：两者都使我感到振奋和喜悦。你的这份掂起来相当厚重的复印稿，我从上海带到屯溪，这回又从北京带到大连。你写得好。谨向你表示祝贺。

王蒙是我国当代文学的奇才。单就他近几年发表的大量小说作品来说，正象你所形容的，恍如“多面多棱多色的艺术旋转柱”，真是五光十色，腾挪多变，使人目不暇给。他总是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东西，总是在探索新的思想，新的意象，新的表现手法。从他那变化多端的二百万字小说著作中，清理出一条贯串线，指出其在不同时期变化发展的主客观因素，艺术上的特色和趋向，并能有所发现，有所阐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我高兴地看到，你胜任愉快地完成了。

象鉴赏家品评名画、象美食家品尝佳肴一样，你以敏锐的内行人的视觉、味觉感受对象，以审美家兼批评家的身份评论对象。你把作品看成是有独立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对象，而不是解剖刀下任人宰割的猎物，表现出你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热爱。你采取了鲁迅提示的“知人论世”的正确态度，或者说，知人、知世

并知音的方法，总是联系时代、社会的巨变、作家的气质、修养及其主客观条件的变动，分析王蒙艺术革新的意义、特色与影响，它的突出贡献与不足之处。特别可贵的是，你带着八十年代新鲜活泼的思想感情（或曰现代意识），八十年代文学的蓬勃朝气，灵活地运用当代最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方法，来研究王蒙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能够时有发现，新的命意、新的论点层出不穷。固然有的命题还需要继续论证，有的论点还需要继续阐明；但联系到当前评论界有些未能令人满意的现状，我读《王蒙论》以及报刊上时而读到的这样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评论，仿佛呼吸到清晨海滨的新鲜空气，使人精神为之一爽。

我读王蒙的中篇新作《名医梁有志传奇》和长篇新作《活动变人形》，感觉王蒙的“艺术旋转柱”以螺旋形上升的方式，又旋转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保持着一贯的时代感与幽默感，心理分析与意识流手法的熟练运用，但从其命意运思，人物刻画以及艺术风格的总体来看，较之两三年前以意识流为标志的新派的（或欧化的）王蒙作品，显得坚实、亲切、厚重得多了。最主要的是，他更着意于性格刻画，着意于塑造具有时代色彩与历史内容的典型人物。他成功地塑造的倪吾诚、静珍、静宜、梁有志、梁有德等典型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给人以心灵上的撞击。这方面，你的独到的发现和论述，很多地方我都有同感。是的，王蒙的文风又变了。王蒙还是王蒙。但是八十年代前期的王蒙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王蒙；八十年代中期（即现在）的王蒙又不同于八十年代前期的王蒙。社会生活在急剧变动，读者的观念、爱好和要求在变动，与时代和人民心心相印的敏感的作家艺术家，不会不因时制宜、随时变通的。只是有些作家艺术家看到的早一些，远一些，从而着时代之先鞭，促文澜之大涌；有些同志也看到了，跟上了，踊跃争先地跑在前头；而另一些同志看得不那么准，甚而走上灰暗曲折的小径，求新而蹈旧，浪费了自己的才力，是很

可惋惜的。而你所说的王蒙的文风三变，还有前面谈到的他的螺旋形上升，表现于他的近年新作的，还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新的开始。他的螺旋形上升，他的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正在以旺盛的潜能继续发展，向着日新又新的高处飞腾。因此，我们在热情地称赞他、直率地提醒他（这都完全必要）的时候，能够留有余地，可能更符合于事物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我可以这么说吗？

忘了在哪一位前人的笔记或诗话中读到这样的话：“人所长言，我短言之。人所短言，我长言之。”我很欣赏这两句话，常以此自励励人，希望治学治文时注意及此。我看你在这一点上是下了功夫的。我记得你在两三处涉及有关的重要论点时，提到这个问题某位同志在某篇文章里谈到了，你同意他的论点，不多说了；接着就放开笔来，阐发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这既表现了一种民主精神，科学态度，也表现了你治学求真的勇气。以评论界谈得较多的王蒙的新颖的艺术手法为例，你的谈法就显得超脱一些，更接近问题的实质。你力求借助于新的、更可靠的思想武器，从新的角度、新的制高点来观察事物的底蕴及其来龙去脉，故能见他人之所未见，发他人之所未发。经过讨论，经过验证，也许你的某个新意尚未站稳脚步，这也不要紧。这至少比那些不能自出新意的文字好得多，并激励你的艺术辩证法以螺旋形方式上升到新的高度。

你要我为《王蒙论》写序言，难倒了我。我很怕为人作序，要看很多材料，这是我的精力所不及的，我采取了通信方式，或者可以写得亲切些随便些。是否重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现话，就置之不顾了。

光 年

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于大连

• 3 •

目 录

DC29/27

读《王蒙论》致曾镇南（代序）.....张九年（1）

第 一 辑

王蒙论.....（3）

第 二 辑

心灵深处流出的歌.....（297）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一

人心的透视.....（306）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二

✓ 有浓度和热度的幽默感.....（314）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三

现代青年心灵的一隅.....（323）

——谈《风筝飘带》

✓ 需要有一点幽默感.....（331）

——再谈《风筝飘带》

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历程.....（334）

目 录

——评中篇小说《蝴蝶》

两代人的青春之歌..... (348)

——读《深的湖》

评《相见时难》..... (356)

也谈《杂色》..... (364)

伊犁，失去诗的诗人心中的诗..... (370)

——读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

灵魂的新的痛苦与焦灼..... (379)

——读《高原的风》

具有深层审美价值的笑..... (382)

——读《冬天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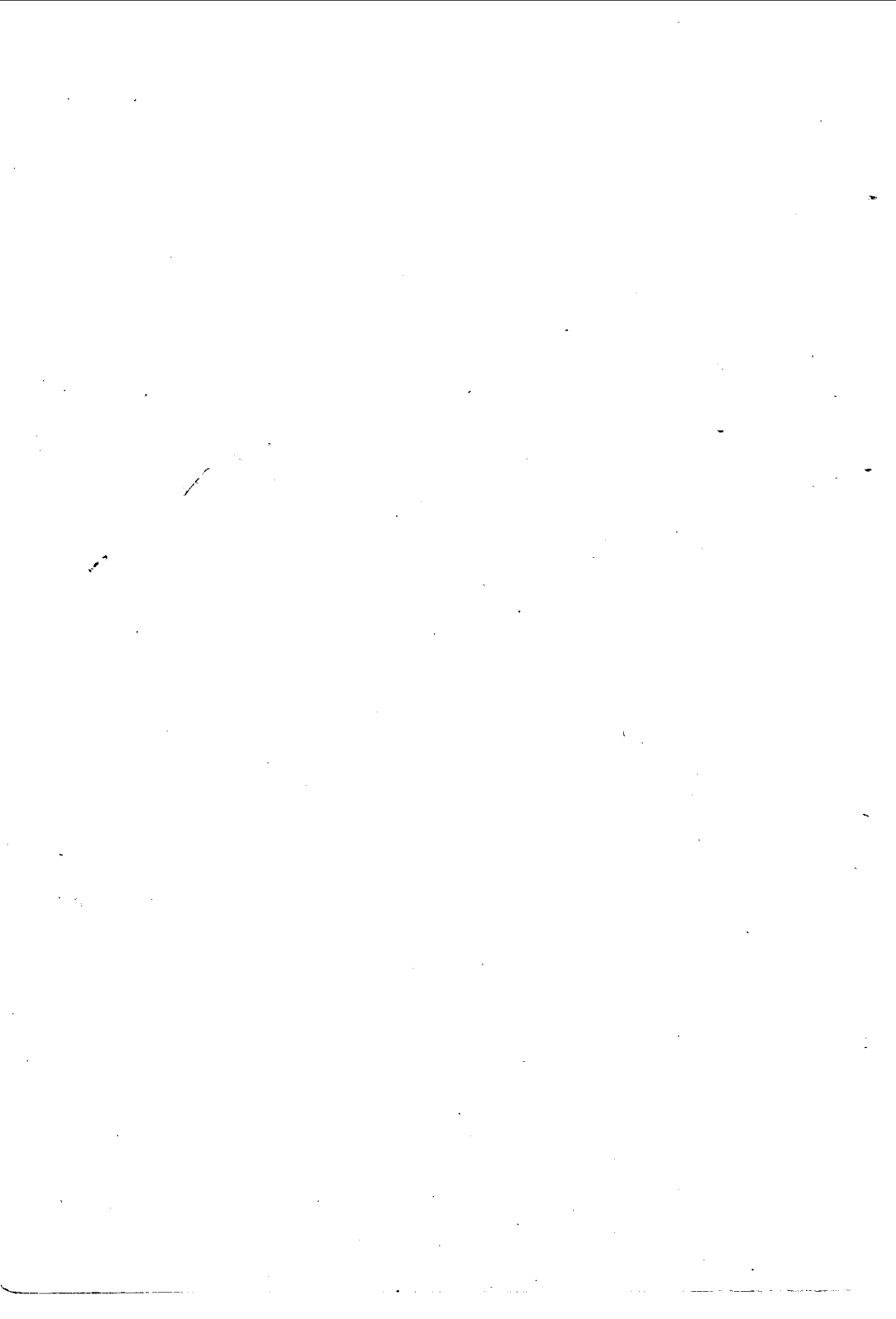
附:

文学与我.....王 蒙 (387)

王蒙主要作品目录..... (397)

后记..... (398)

第一辑



王 蒙 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而确定地认识到：王蒙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位杰出的代表性的人物了。他不但是始终处于时代潮流前列的、充满活力和新鲜感的优秀小说家，而且也是不断提供新颖独到的艺术见解、热情不倦地培植文学新人的优秀批评家。他在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方面，也展开了广泛的、卓有建树的活动。就文学劳作的实绩和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而言，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恐怕是罕有其匹的。

全面地展开对王蒙的研究，将会成为吸引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是，本文主要论述的，还是作为杰出的小说家的王蒙。从一九五三年王蒙拿起笔写《青春万岁》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这其间王蒙几乎搁笔了二十年，实际的创作时间也就十三年。但他以惊人的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近二百万字的小说创作，近一百万字的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王蒙的创作活动，还远未达到他自己的颠峰状态，他还在源源不断地拿出他的越来越深厚、瑰奇的小说新作。所以即使是我这篇试图比较广阔地展开论述、预计篇幅较为浩大的研究论文，也只能粗描往迹，而不能眺望前程。也许现在写下的文字，到它付梓问世之时，就会在王蒙更新的作品面

前显出它的凝滞和片面；但凝视王蒙小说这个多面多棱多色的艺术旋转柱，毕竟是一件有兴味的事情。况且，不管具有自觉的批评意识的王蒙怎样提挈自己的创作活力，穷“翻”极“变”，出神入化，躲闪腾挪；也不管读者和批评家们怎样觉得眼花缭乱、难以追踪，毕竟，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去涉入王蒙的创作之流，并获得自己相对的但也是确定的认识。

在这里，辩证法所承认的人对研究对象认识的相对性，并没有取消人对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相对真理的认识中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

让我们升起信心的帆，把探究艺术秘密的小舟，驶入王蒙那波光闪烁的创作之流吧。

—

一提起王蒙，不管人们对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体持异常钟爱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都会几乎一致地说：“这是一位最富有思想的当代作家。”人们的这种普遍的感觉，确实抓住了王蒙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最根本的特征——他那种极其灵敏地感应时代的最新变化，倾听生活最细微的声息的才能，使他的小说中的艺术世界，象内层深邃稳定而水面时时在涌动、旋转、沸腾的思想的大海。当然这是由有形有色有光有声的生活的活水汇聚成的大海。当王蒙张开艺术概括的巨翅，在巨大的时空跨度中拥抱历史和时代时，我们听到了他的小说中思想的瀑布訇然而落的声音；而当王蒙伸出艺术感觉的触角，在细微的心灵波流中探寻生活的脉息时，我们也能听到他的小说中思想的电火在金属尖端毕剥的微响。在艺术风格和文体上都与王蒙异趣的作家徐怀中和刘绍棠，在谈他们对王蒙小说的观感时，不约而同地都注意到了王蒙创作的这一特别富于思想的特征。

徐怀中认为，评价王蒙的创作，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些具体的

艺术形式、艺术手法，而要着眼于更根本的方面。在他看来，王蒙作品“最为光彩和最为重要的特色，在于这些作品紧紧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准确地拍合着时代交响乐曲的节奏，似乎作品有着一种先天的节奏感”^①。“随便拿出那一篇来看……总是有一条无形的脐带同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的。”^②刘绍棠则认为：“王蒙那些思想机敏、言词犀利的感想和联想，是从小说的人物身上和情节中生发出来的，因而并不违反艺术特征，也是形成他的艺术特色的组成部分。”^③

这两位作家的意见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都以自己正确的美感，感受并触摸到对评价王蒙来说至为关键的问题，即王蒙那种感应时代的机敏犀利的思想才能，是怎样长入了王蒙作品的艺术生命的活生生的存在方式之中。徐怀中所说的那种迅捷准确地拍合时代进行曲的“先天的节奏感”，正是一种被思想内容决定的艺术特色。这和刘绍棠所说的思想的机敏犀利恰恰是形成王蒙作品的艺术特色的组成部分，是所见略同的。

然而，对于更深入的研究来说，不能满足于发现和描述王蒙创作特别富于思想这一根本的特征，而必须给自己提出具体、明晰地阐发、评价王蒙小说中的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不同的作品中艺术结晶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其表现又是纷纭万状的——的任务。也就是说，要下一番功夫去摸索那条把王蒙的作品和时代的脉搏连结起来的“无形的脐带”。凡是熟悉王蒙作品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是一个相当繁重的、而且容易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那些在长篇巨制中磅礴奔涌，在微型短章中闪烁明灭的思想，是很难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姿影的。

而且，研究王蒙小说中的往往是沛然而至的思想，又是和研

①② 徐怀中：《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引文中重点号系引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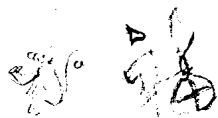
③ 刘绍棠：《我看王蒙的小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引文中重点号系引者所加。

究王蒙小说中常常是油然而生的艺术直觉相联系的。如果说王蒙是一位特别富于思想的作家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说王蒙是一位特别敏于直觉的作家这个判断也几乎是同样正确的。从这个作家的气质来看，与其说王蒙是偏重于思考型的作家，不如说他是偏重于感觉型的作家。甚至可以说，他作为小说家的主要魅力，越来越表现为他是凭借对活泼泼地流动的生活的惊人准确绝妙的艺术感觉进行写作的。王蒙不止一次宣称他“坚信艺术的直觉、艺术的感觉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①。他说：“我喜欢小说中反映的那种活泼泼的、鲜亮而又流动的生活，我喜欢小说反映生活的时候象是用手捧出了一掬海水，水还从指缝里往外滴滴哒哒呢。”^②虽然他的小说，并不是每一篇都胀满了生活的汁液，但综观他创作的全体，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流动着、旋转着、迸溅着生活的海水。王蒙小说中思想的精灵，是在他的灵动的艺术感觉中，在生活的激流中，作急速眩目的旋舞的。这也增加了人们接近它、把握它的难度。

研究王蒙小说中的丰富的思想，还必须充分估计到作家那种特有的个性、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感受方式。因为正是这些非常特殊的因素造成了他小说中的思想的那种扑朔迷离、兔起鹘落、如痴如狂、渊深难测的外观。

在王蒙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不难发现他有一个最突出的思维特征，那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惊人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常常使我感到：王蒙的思想一旦迸发，就象水银泻地、泥丸走坂、骏马注坡，具有令人晕眩的迁移的神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自然界、社会、人的思维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没有任何一种规则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种辩证法最充分地揭示了事物的不居

①② 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漫话小说创作》第8、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性、物质的运动性，它最不能容忍思想的凝滞、僵化、“定于一”。王蒙几乎是自发于迷醉于辩证法，并非偶然。从主观方面看，王蒙天资聪颖，在他生命的根柢，似乎时时躁动着一种创造新事物、生发新见解的热情。这是驱迫他、烧灼他的不息的火。从客观方面看，王蒙身历旧中国的崩溃，新中国的诞生，五七年的厄难，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新时期的二次解放这样一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巨变，历史运动的客观辩证法给他提供了浩繁、强烈的印象，巩固、提高了他对世界的辩证观感。在他对社会、对人的命运的观察中，充满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甚至是现世报应的感性印象。这种感性印象在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的唯物辩证法的统驭、炼铸下，就沉积为一种清明洒脱的沧桑感。王蒙十九岁就投入了文学创作。他观察社会和人的命运的辩证思想又成了他观察文学现象，探寻艺术奥秘的武器。他是一个高度要求艺术的独创性，对此甚至达到了苛求程度的艺术家（他说过：“宁可创造出一粒沙，也不要套出一座山。”^①）。在艺术创造中，他反因袭，重“翻变”^②，憎厌套套而追求“绝活儿”，自然要借助于辩证法这盏智慧之灯。于是，我们在王蒙小说的思想中，在王蒙的文学评论中，常常看到幽光狂慧，看到天纵之神思，看到机锋、顿悟、妙谛，感到如飞镖、如电光般的思想的速度。对，速度！思想在把握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客观事物自身的各个侧面时，是需要速度的！王蒙习惯于思想突发的闪击和疾速的迁移。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他的文思之快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甚至连语言这个思想的物质外壳也因为思想的疾速流动，而仿佛失去了它的物质性，变得轻灵如风了。王蒙迅捷地调集大量语汇为表达他的高速运动的思绪服务的能力，给我们每一个读他的文字或

① 王蒙：《当你拿起笔……》，《当你拿起笔……》第12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参见王蒙：《翻与变》，《王蒙谈创作》第2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听他讲话的同时代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但王蒙这种迅速地进行辩证思维的习惯，有时候也会产生缺点。列宁指出过：“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①我当然不认为王蒙有什么诡辩法的倾向，而是想请王蒙注意一下列宁所指出的这个辩证法本身固有的转化为诡辩法的危险，在淋漓尽致地发挥辩证思想的灵活性的时候，不要过份陶醉于概念和语言的灵活性而已。主观随意性是很容易在这种灵活性中下意识地产生的。

除了这种辩证的思维习惯的神采及微疵之外，王蒙思想素质中的幽默成分及其丰富多采的表现形式，也是我们在探究王蒙小说的思想时必须特别注意的。王蒙在给一位研究者的信中说：幽默“是贯穿我的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稳定的因素”^②。关于王蒙小说中的幽默风格问题，本文将有专节予以论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王蒙小说中的思想，由于披了滑稽突梯的衣裳，更增加了我们进行分析的难度。

在因民族灾难的深重而形成的忧国忧民、操切世道人心的中国文人思想传统里，一向多的是浓重的悲怆成分。中国古典文学中悲凉慷慨之音，几千年来不绝如缕。从《诗经》中的“黍离”之怨，屈骚中的泽畔悲吟，一直到《红楼梦》中“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似乎铸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典型意绪。这种典型意绪也濡染着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作为美的品类之一的喜与幽默，似乎就没有得到过长足的发展。即便“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的鲁迅作品，给予读者的总体美学感受，如郁达夫所惊人准确地概括的，也是“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③而从十年浩劫中崛起的新时期文学，就整个文学氛围和

① 列宁：《论尤尼乌斯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 第850页。

② 转引自陈孝英：《论王蒙小说的幽默风格》，《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

③ 郁达夫：《鲁迅的伟大》，《郁达夫文论集》第73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美学风格来看，也以悲歌慷慨为时尚。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学思潮，它源于客观的历史悲剧和社会灾难。几乎与惨痛愤激的“伤痕文学”，沉郁顿挫的“反思文学”涌现的同时，钱钟书发表的文艺美学论文《诗可以怨》^①和王蒙发表的当代文学评论《悲非罪》^②，一远一近地为这种美学风格发出了相映成趣、耐人寻味的声援。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写出了悲怆的《歌神》、凝重的《最宝贵的》、悲悯的《表姐》、《友人和烟》的王蒙，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幽默作品的创作，并一发而不可收地形成了他整个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色调。这当然反映着王蒙思想的非常复杂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及其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产生的歧异的反响，为我们提供了探寻王蒙思想发展端倪的丰富、生动的材料。这些材料的茂草深处，就蜿蜒着一条需要踏勘的王蒙文思的轨迹。

在充分意识到把握王蒙小说的思想内涵的难度，就要转入对王蒙创作实践的评述之时，我想作一点方法论上的“务虚”也许不无意义。在我看来，对于研究一个作家，特别是研究一个比较地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杰出作家来说，最为便捷、切近、可靠的研究方法，还是鲁迅在五十年前就提出的、被他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所谓“知人论世”法。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③在鲁迅所阐述的这一方法中，我以为包括着两层意思。这两层意思对于王蒙小说中思想内涵的开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首先是“论世”，也就是研究作家“所处的社会状态”，研究作家所经历的时代。这也就是唯物史观的批评方法。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

① 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② 见《漫话小说创作》第174页。

③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第430页。

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研究一个作家，也同样必须把他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即如研究王蒙作品中的思想，就必须对产生这些思想的独特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

综观王蒙的经历，有三次巨大的历史事变对产生他那独特、丰赡的思想，起了强烈的激发和熔铸作用。他从少年时代就投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陷于长达二十年逆境、被迫搁笔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使他的身心获得又一次解放的新时期的开始。——这就是以自己的血与火与泪，以自己的光和影和声进入了王蒙创作世界里的三次历史巨变。离开了王蒙在这三次历史巨变中的独特遭际和独特命运，就不可能具体明晰地说明王蒙小说中的思想，也不可能准确地评价这些思想（当然是结晶在艺术形象、画面、意境中的）的历史价值。

第二，还要“知人”，也就是“顾及作者的全人”，研究作家的身世、家庭、文化教养、文学师承（即使象王蒙那样无一定师承，也是一种文学师承的殊态）、天分个性等等，充分注意到作家的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烙印。在这里，就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分析方法。

马克思认为：“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②这是真正“知人”必循的辩证法。这里并不存在对著作家个人自我感觉的诚实性的怀疑问题，而是承认人类普遍存在的，几乎一切杰出人物都概莫能外的“自视”与“旁观”的因角度不同而产生的观感差异问题。这一点对于研究王蒙是特别重要的。由于王蒙是一位具有清醒的批评家意识的作家（或者说他集批评家与作家于一身）；也由于王蒙追求的艺术创新在中国文坛的具体条件下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卷第512页。

② 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3页。